

翦伯赞全集

第五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翦伯赞全集

第五卷

历史问题论丛续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说 明

本卷定名为《历史问题论丛续编》，所收文章共44篇，发表时间以新中国时期为主，少量发表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实为“全集”第三、四卷《中国史论集》一、二辑及第四卷《历史问题论丛增补本》的编余。文章粗分为四类，第一类以理论性文章为主；第二类以史事为主；第三类以文艺、戏剧评论为主，第四类以有关历史研究的讲话为主。其中有若干篇访问日本和参加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的学术报告、纪要及回国后发表的回忆、介绍性文字，有的还是日文原件，这些文章亦以类相从，编入书中。

本卷由张传玺、张怡青、张海青编辑、校订。

张传玺

2006年10月6日

历史问题论丛续编

目 录

与历史系青年教师谈如何研究历史	(7)
批判胡适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与方法论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座谈会发言摘要	(11)
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	
中國史の時代區分の問題について	(15)
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诸问题	
中國の時代區分について	(30)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文化遗产诸问题	
中國の資本主義の萌芽および文化遺産その	
他にフこて	(58)
历史学的新方向新道路	
——介绍《清河制呢厂五十年》	(76)
谈中国农民战争问题	(80)
存在于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和中国历史	
上的民族关系问题	
——在南京的学术讲演摘要	(82)
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的问题	(91)
在广西历史学会上的学术报告	(98)
要把基本理论放在首要地位	(126)
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	
——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	(128)
中国进步的文化	(140)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中国历史	(150)

新中国的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	(155)
古代的中国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161)
戊戌变法书目解题	(202)
义和团书目解题	(26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义和团》校后记	(329)
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	
偉大な民主主義革命家——孫中山	(332)
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	(342)
评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	(344)
迎接划时代的历史文献	(347)
略论殷商的青铜器文化	(350)
就“韦昭仗正于吴朝”一语答问	(360)
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	(362)
中国宪政运动的过去与现在	(398)
论五卅运动及其历史教训	(408)
我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意见	(416)
丰富多彩的缅甸音乐与舞蹈	
——欢迎缅甸文化代表团的演出	(421)
亲戚般的友谊	(425)
关于《孔雀胆》	(428)
谈历史画	
——看了尹瘦石的历史画以后	(431)
关于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问题	(434)
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440)
为召开科学讨论会问题答北大校刊记者问	(442)
在文字改革问题座谈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444)
记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	(447)
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	(453)

访日观感

——谈所见到的日本学术界（摘要）	(463)
回忆日本之行	(467)
我对《北京史稿》的意见	(475)
在《外国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	(481)
在广西历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484)



与历史系青年教师谈如何研究历史

经过上学期整整一个学期的摸索之后，同志们都已经初步明确了进修的意义，进修计划也订得比较实事求是了，一般说来，大家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工作，而且大致上也都还能保证完成。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着，谁都不满意于自己在进修上所取得的那点成绩，大家都有自己的苦闷，读书笔记怎么写呢？卡片怎么做呢？学了理论怎么样去与业务结合呢？上学期学过的东西这学期又忘了怎么办呢？特别是如何深入钻研呢？……

问题是多半偏重于学习方法。显然，光靠支委或靠同志们本身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

于是，一天晚上，在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先生的客厅里挤满了人，一次团支部会就在翦先生家里召开了。会上还邀请了历史系的年轻助教，党员同志们也来参加了。翦老为我们介绍他几十年来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经验。

翦老先谈到目前党和政府如何关心历史科学的成长，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性，接着就开始叙述自己学习历史的过程：

“我学历史最初是从学理论基础和历史知识开始的：我在幼年启蒙的时候，读了《三字经》和《纲鉴易知录》，这是陈伯达同志所推荐的历史教科书，当时我也受益不少，长大了就喜欢历史，爱看小说，爱看旧戏，后来就读《通鉴》。在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时候，我先按照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把书里有关各个阶段的话都用铅笔分别画出来，然后就动手分别把它们抄在几个本子上，这样经过自己整理以后，我就试着写了一本社会发展史（没有出版），使自己有了比较系统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然后我又把一些可以论证上述规律的中国历史上的材料分别抄在上面所说的那

些本子后面。再经过一番整理，我便又写了一本历史哲学教程，这样我便对历史唯物论有了比较系统地了解。这也就在纵的方面和横的方面巩固了理论知识。当然，这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但不能怕错误就不在理论上下死功夫，教条主义是不对的，而不能不学理论。这以后，我才开始进行中国历史的研究。……”

“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实际生活时常给我不少启发，我当时也就把研究历史当作和黑暗现实斗争的武器，在斗争中锻炼了自己。”翦老继续说：“抗战时我住在后方看见许多由江浙西迁的产业资本因为广大地区沦陷了，市场缩小了，失去了活动的场所，而变为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情形，我便想起汉朝当西域等地广大的市场失去以后，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情形，仔细一查史料，果然和我所想的一样。那时中日之间走私的情况非常厉害，我便想，在南北朝对立时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形。”

翦老接着又列举了许多非常宝贵的例子告诉我们他如何运用学到的理论和深入生活的经验去研究历史的。翦老以为，在分析一个历史事件时，不妨先根据推理，大胆提出自己的假设，然后根据假设，有目的地去找材料。翦老说：“在学习《矛盾论》以后，我很有些体会：那时我正在研究‘侯景之乱’，我根据毛主席关于矛盾转化的理论，觉得当时居南朝的汉族与北朝的胡族之间的矛盾已经退居次要的地位，而北方来的居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与南方本地的人民群众以及地主阶级间的矛盾则已转化为主要矛盾；因此，我便推想当侯景事变时，南方的少数民族的人民和地主阶级一定会起来反对北方地主的统治，于是我便动手找这两种反抗的史料，结果都找着了，而且很多。”“当然，材料不一定每次都找得到。”翦老补充说：“找不到也没有关系，那你就承认你的推断没有证据就行了。”翦老说，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像过去的历史家那样被材料所埋葬，而是材料为我所用。材料像一个宝库，要进得去，出得来，所谓七进七出。

“历史的对比虽然不一定完全恰当，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用。”翦老继续说：“例如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书中分析当时一方面俾斯麦在政治上限制德国的资产阶级，但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却又把他作为自己的代表这种矛盾现象时，指出当时虽然俾斯麦在政治上打击了资产阶级，但是他的政府却保证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发展。这种分析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就很有用处，它使我想起了汉朝历史上一件令人无法解释的事情——一方面汉朝是地主、商人的统治，但是它又在许多方面限制商人的活动，禁止商人做官。……同时，还要从历史环境的本身去发现问题，例如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关系，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以及一个问题要摆在一定大的范围中来看出它的地位，在全局中看局部，这要视野愈广愈好，坐飞机看。至于研究问题本身时却要十分精密、细致，用显微镜看。这都是我自己在思索问题中的一些体会，供给大家作参考。主要的乃是同志们自己刻苦钻研，稳步前进，我今天在研究问题也还有急躁、粗枝大叶的情形，这是需要克服的。”

夜深了，会只得结束了。翦老最后勉励我们说：老一辈的经验是有限的，同时学习的条件也不及你们今天好，你们都是青年团员，应该立志使历史科学发扬光大起来，为人民解决更多的历史问题，把历史科学水平进一步提高。”

同志们一致认为翦老这次报告对自己很有帮助；许大龄同志说：“翦老谈的七进七出真好，过去我们有了材料老是不知怎么用，今天才算是知道了一些怎样利用材料的方法。”张广达同志说：“翦老用矛盾转化的道理来说明南朝社会，使我想起了最近我们正在学习的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当时统治的希腊人和被统治的本地人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上的关系，简直就和翦老所说的例子差不多。”常竟超同志则说出了我们大家的感受：“平时学理论都比较一般化，不容易十分直接的用来指导自己的学习，翦先生所说的这些经验则非常具体的展

示给我们一条如何进行历史研究的道路。”我们青年团员就是要不断虚心学习老教师的丰富的教学和研究经验，更好地把自己培养起来。

《北京大学校刊》第14期，1954年4月15日，
原题《翦先生指导我们如何研究历史》

批判胡适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与方法论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座谈会发言摘要

刚才各位同志从各方面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展开了批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不过从各位的发言中，我得到一个印象，即都认为胡适的历史知识很浅薄，有些蔑视他的意思。关于这一点，我想略加补充，我以为不管胡适的历史知识如何浅薄，他还是有他的一套，否则他就不能哗众取宠、欺世盗名，横行中国学术界达三十几年之久，把许多人变成他的俘虏，甚至到解放以后，他的影响还没有消灭。因此我以为我们固然不要把他估计太高也不要把他估计太低，估计太低就是轻敌，就会贬低我们反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一思想斗争的严重意义。

我对于胡适刚才开始研究，对于他的一套，还不甚明白，现在只能发表一点不成熟的意见，请同志们批评。

首先，我想说到胡适的立场，这是他的历史观的出发点。过去有人以为胡适是“超阶级”的书生，他没有什么立场，就是想做大官、出大名。实际上，胡适的立场是很鲜明的，他是公开地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发言。正因为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是带有买办的性质，所以他就不仅是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也是和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的出卖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

胡适把诽谤祖国当作献媚于帝国主义的工作之一。他在祖国的光辉的历史和文化之前闭着眼睛，硬说中国“百事不如人”。如果有人“中国也有文化”，他就说“这是夸大狂妄的人捏造出来的谣言。”他抱着极大的热情去寻找证据，证明中国的一切都是落后的坏的，包括印刷术的发明在内。他认为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太早，妨碍了校勘学的发展。他公开地诽谤中国的人民，特别是他

所谓“最下层”的人民，他说：“坏的起于最下层，而不出于优秀分子。”根据这个原则他就否定了中国的小说戏剧的价值，因为这些都是“起于街头弹唱的小民。”在胡适看来，一切东西之所以是坏的，就是因为他是中国的，尤其是因为他是“最下层”人民创造的。在相反的方面，他毫无廉耻地歌颂帝国主义的一切，包括娼妓制度、自杀、贿赂，乃至强盗式的侵略行为在内，甚至歌颂中古欧洲的“初夜权”、“贞操锁”，他认为这些都是最高无上的文明。自然胡适的一切努力，不管是他的文学、史学或哲学的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他的千言万语，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不要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要学他一样被杜威牵着鼻子走，去做蒋介石匪帮的过河卒子，去做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

其次，说到胡适的历史观。胡适的历史观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再加上陈旧的进化论，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他就想用这样落后的生了锈的武器来进攻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而且真的这样做了，这总算是帝国主义最勇敢的奴才。

为了反对历史唯物论，胡适首先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认为历史是可以任意雕刻的大理石，是可以任意摆布的大钱，是可以任意涂抹脂粉的“百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让唯心论者任意修改的“一幅未完的草稿”。用一句话说，胡适以为历史的发展，是不受任何客观条件的限制，更没有任何规律性可言，人想创造什么历史就可以创造出什么历史。因此，他强调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说日本明治维新是伊藤博文等几十个人的努力造成的，中国的军阀混战是由于无聊政客的挑拨，五四运动是因为他的一个女朋友掉到水里引起来的，甚至说一个人吐一口痰都可以引起几十年的战争。这些说法，不但谈不上甚么科学，而且简直没有常识。然而他就企图用这样的谬论来攻击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不过重复他的前辈已经破了产的说教而已。

由于从唯心的历史观出发，胡适否定客观条件对人类意识可

以起任何决定作用。他认为宋词元曲的产生和他们的时代背景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因为“好妓好歌喉的引诱”刺激出来的。《水浒传》上描写的故事，都是“照例的刻板文章。”《红楼梦》是“空中楼阁”，是“作者由其兴会之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然而照我们所知道的，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者所处的时代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当然他所反映的并不是直接的现实生活而是典型化了的生活，即具有现实的本质的、主要的、富有特征的生活。

胡适又企图用陈旧的进化论的观点来反对历史上有突变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他说历史是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改变，在胡适看来：“太阳之下，没有新的东西。”但是具体的历史并不因为胡适的反对而遂停止他的突变，人民的中国在太阳之下出现了。

最后说到胡适的历史方法。胡适自鸣得意的方法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自以为这样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也有人觉得他的这种方法，是有点合乎科学。是的，科学并不反对假设；更不反对求证，但科学的假设与求证，和胡适的假设与求证毫无共同之点。科学的假设是指待证的真理，而胡适的假设是主观的成见，科学的求证是真凭实据，而胡适的求证是歪曲、涂改乃至捏造证据。例如他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于是大胆假设中国没有封建社会，也没有帝国主义，然后捏造证据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在两千年前就消灭了，又捏造证据，证明中国的贫弱，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由于五鬼。特别是疟疾，于是伪造历史，说希腊罗马的灭亡都是由于疟疾。总之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歪曲涂改，乃至伪造历史事实，通过文学、哲学、史学等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发挥他反祖国、反人民、反革命的政治成见。从方法论上说，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是从观念回到观念，因而并不是甚么科学的方法，只是一种概念的游戏。然而胡适就用这种方法做他的考据学，因而他的考据学也决不能“去伪存真”，反之而是“去真存伪”。自然我们不应该因此就否定考据学，考据学对于历史资料的鉴定，还是有它的

用处。

胡适还有一种方法，即“明因求变”的方法，亦即他所谓“祖孙的方法”，他以为他的这个方法也是科学方法。是的，科学并不反对“明因求变”，但仅仅“明因求变”并不能解决科学上的任何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都不能把他的因果孤立起来，任何历史问题的因果关系和历史问题的本身一样，都与其他历史问题的因果关系错综交叉，因此为了究明一个问题就必须如毛主席所指示的要“由此及彼”地加以研究，历史问题决不像胡适的头脑那样简单，同一原因，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结果，又可以成为另一问题的原因，这是简单的因果律论者所不能了解的。然而胡适就用这种简单的方法来大谈其中国哲学史，而且他的哲学史连这种简单的方法也没有很好地应用。

胡适已经是一条死狗，我们现在是打死狗，也许有人说打死狗何必用这样大的力气来干，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条死狗和其他死狗不同，他的阴魂未散，还在新中国作怪，他还企图在新中国借尸还魂。现在胡适的阴魂也许已经附在我的身上，也许已经附在在座的某些同志身上。因此，我们都要好好地检查一下，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胡适的阴魂，如果有就要把他赶走，因此，打这条死狗比打活狗更要困难，所以必须投些力量。今天我们北大历史系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我希望把这个思想斗争继续下去，步步深入，我预祝我们在这一个严肃的思想斗争中取得光辉的胜利。

《北京大学校刊》30期4版，1954年12月24日；

《光明日报》1955年1月6日“史学”47期)